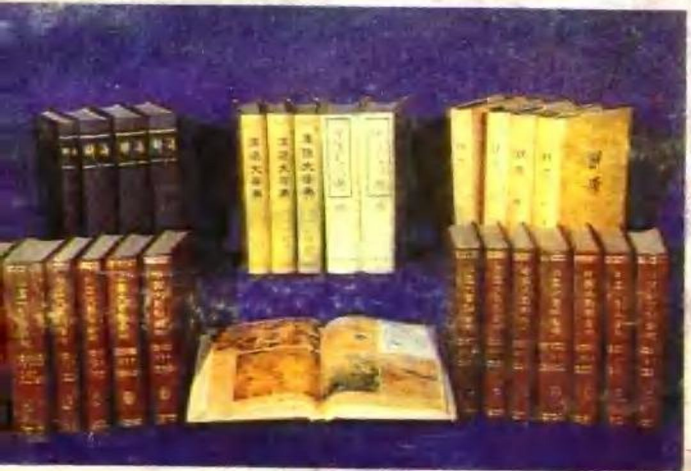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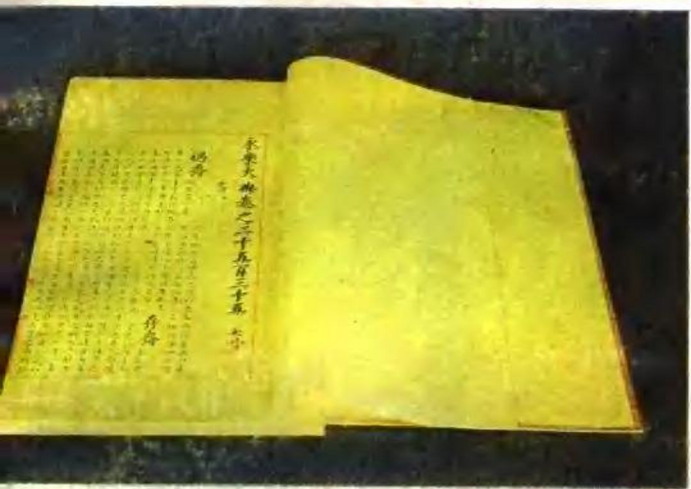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



# 北京出版史志

忆出版委员会

以前京版自然科学图书举要

泽东著作京华外文版纪事

国初期北京的私营图书出版业

国时期京版的史地图书

国第一次书稿交易会

## 第6辑

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 SHIZHI

# 北京出版史志

## 第六辑

《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史志  
BEI JING CHU BAN SHI ZHI

第六辑

《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7印张 150000字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  
ISBN7-200-02811-8/K·301  
定价:7.40元

# 目 录

北京出版史志

第6辑

---

回忆出版委员会 .....	王仿子 (1)
清以前京版自然科学图书举要 .....	爱新觉罗·常林 (21)

---

## · 燕京出版史事 ·

清代北京图书出版杂俎 .....	李致忠 (65)
清以前京版法律图书述略 .....	韩长泰 (78)
毛泽东著作京华外文版纪事 .....	郭选 (84)
建国初期北京的私营图书出版业 .....	魏玉山 (91)
关于机械工业出版社二三事 .....	陈元直 (113)
新中国第一次书稿交易会 .....	齐立 (118)
宣武区出版业钩沉 .....	刘向勃 (120)

---

## · 京华出版苑 ·

民国时期京版的史地图书 .....	邱崇丙 刘志学 (125)
民国时期京版的工程技术图书 .....	洁华 (155)
民国时期京版的经济图书 .....	邱子钊 (161)
民国时期京版的军事图书 .....	赵良珍 (173)
民国时期京版的农科图书 .....	邱崇丙 (183)
京版社会科学图书统计 .....	曹鹤龙 (188)

---

· 出版机构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简介 ..... 郑伯平 (196)

---

· 名人与出版 ·

通俗读物编刊社和顾颉刚 ..... 郭 敬 (198)

---

· 史海拾贝 ·

《四库全书》防火史话 ..... 王铭珍 (200)

---

· 出版纪事 ·

北京出版系统大事记 (1966年6月~1976年) .....  
..... 潘庆海 (203)

---

· 编读往来 ·

方厚枢致书《北京出版史志》编辑部 ..... (218)

---

· 资 料 ·

版本知识 (一) (20)    版本知识 (二) (64)    聚珍版本因火而  
消失 (119)    版本知识 (三) (124)    版本知识 (四) (154)  
北京出版的第一本外国法律全书 (160)    释“资政” (187)    清政  
府在北京成立的官办出版社 (195)    馒头铺租赁唱本 (199)    清代  
《京报》的出版发行 (202)    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著作权法 (217)

# 回忆出版委员会

王仿子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入北平，世界驰名的古都在不费一枪一弹下和平解放。2月23日，新中国第一个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出版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以下简称“出委会”）在北平成立。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的一个临时性组织。它既是党领导出版事业的一个管理机构，又是出版课本、书籍和杂志的生产部门。按出委会主任黄洛峰的说法，它“不仅是进行出版业务的一个企业部门，更重要的它还是我党出版工作的领导机关”。它的特殊地位，决定它肩负向新解放区人民大众供应党的政策文件、干部读物、中小学课本和接管平津敌伪出版印刷机构，统一华北地区出版发行工作以及团结私营出版业的双重任务。

我在1949年初，从香港经朝鲜到达大连，在光华书店担任出版工作。6月中旬接到北平调令，抵达北平到出委会报到。当时出委会与新华社同住司法部街75号一幢大楼。

黄洛峰是1949年2月到达北平的。1948年6月6日，他还是读书出版社负责人的时候，在香港接到周恩来致香港章汉夫转胡绳电。转告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的负责同志：“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主力逐渐转来解放区，资本亦尽可能转来……”（见《周恩来年谱》第775页）。三店负责人加紧筹划三家书店的合并，组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

店，并把三家书店的骨干经水路和陆路分批输送到解放区。黄洛峰于12月初离开香港，经安东、沈阳到达北平。

从1949年到现在不过46年，但是，岁月的流逝，磨蚀人们的记忆力，诸如出委会机构的名称、委员人数、地址以及出版书和杂志的情况等许多往事不少人已经淡忘，甚至记忆错乱，说法不一。当年共事，而今在世的同志也越来越少了。我感到有必要尽可能把我记忆中的印象和查得到的一些零星资料串起来，留下一个记录。

## 一、出版委员会的名称和地址

对于出委会名称，近年有三种说法：（一）出版委员会；（二）中共中央出版委员会；（三）华北出版委员会。

《当代中国出版事业》一书的第一章，《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立》，有如下记载：“二月，华北局宣传部受中共中央的委托，成立华北出版委员会（中央进入北平后，由中宣部领导，名为出版委员会）。”我到出委会的时候（6月），没有见过出委会的牌子，大门口没有，司法部旧楼上也没有。我用过牛皮纸的竖式信封，上面印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的扁宋体字。但是，印象不一定可靠。为了证实，我找过几位熟人，找到一个出委会举办的业务训练班的结业证书。这个证书的名称就叫“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业务训练班结业证”，有训练班主任黄洛峰和副主任华应申的签名章。发证日期1949年7月10日，在发证日期上盖有阳文篆体的“华北出版委员会”一方图章（附图1）。

这个结业证书说明两个问题。出委会的全称应是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或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简称出版委员会；成立初期叫华北出版委员会。原因是二月间成立时，中宣部还没有到北平，委托周扬领导，而周扬当时任华北局宣传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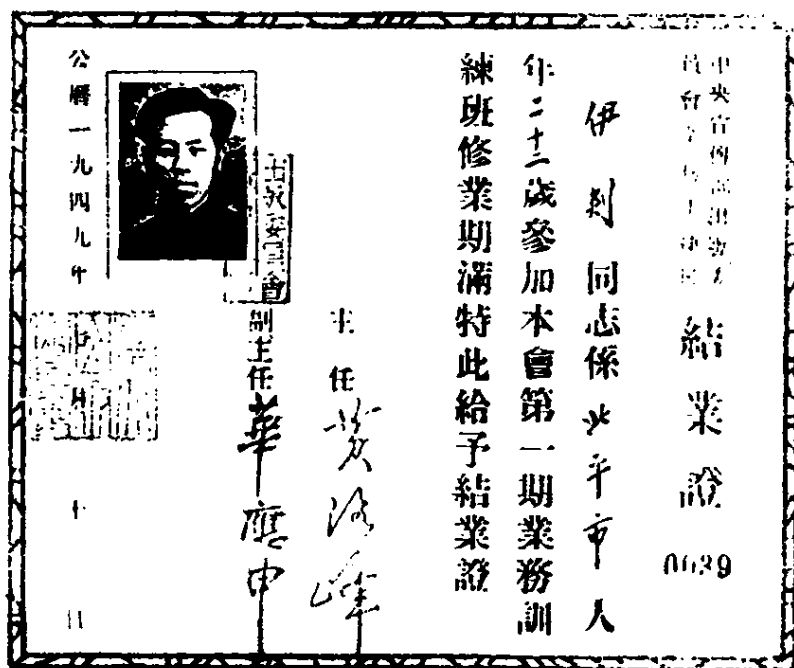


图 1

部长。黄洛峰在 10 月 3 日召开的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上作的《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工作报告》)里亦说到：“二月中洛峰经东北到北平，中央决定成立出版委员会，……在中央还没有搬到北平以前，由华北局宣传部周扬同志领导”。3 月间中宣部进城，周扬调任中宣部副部长，出委会就归中宣部领导，不再用华北出版委员会的名义了。虽然那颗图章还留着，在发通知时已改用一颗木质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图章了(附图 2)。

关于出委会的办公地点，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这个条目中说：“机构设在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如果要说得周全一些，可用黄洛峰的说法：“2 月 23 日我们就开始在大院胡同 5 号办公，3 月 28 日迁入司法部街 75 号，……截至最近为要腾给司法部房子，9 月 21 日又迁到东总布胡同 10 号”。

司法部街 75 号(注：司法部街是长安街上南北向的一条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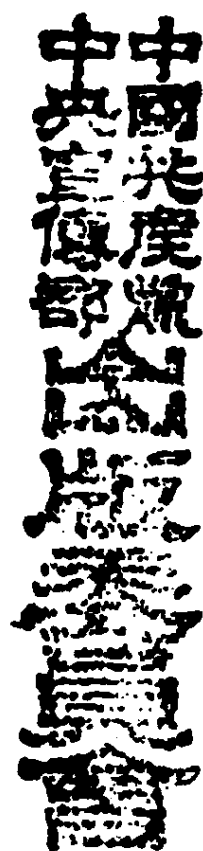


图 2



街，因建人民大会堂而拆除）原是北洋军阀时期旧司法部的一幢两层楼，是座西朝东。3月间与新华社一起从大院胡同迁来，基本上一家一半。一进楼门是一个水磨地的大厅，成为每周六晚上摆开场地跳交际舞的地方。新华社有一个业余的乐队，看样子是在延安时期就有的。参加跳舞的也是延安来的人多，我和程浩飞、倪子明等从国统区来的都不会跳。食堂也是共用，分小灶与大灶，严格按解放区的制度，除少数几个领导人外，一般处科级干部都吃大灶。主食是棒子面的窝窝头。

东总布胡同10号是俄文专科学校的旧址，瞿秋白曾在这里任教。由大小两个四合院组成，还有一个操场。购得旁边一座带花园的民宅，连成一片。出版总署成立后，为了纪念瞿秋白同志，把其中一座独立的教室命名为秋白堂。

出委会迁到东总布胡同后紧接着就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9月23日晚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代表团团长谈话会。

## 二、委员名单和组织机构

关于建立出委会和委员的组成。黄洛峰在《工作报告》中是这样说的：“在1948年8月间，中央鉴于当时的形势和对以后局面开展的估计，就决定建立出版工作的全国性的统一集中的领导机构。”又说：“2月中旬洛峰经东北到北平，中央决定成立出版委员会，首先统一领导平津及华北地区的党的出版工作，并指定黄洛峰、祝志澄、平杰三、王子野、华应申、史育才、欧建新等为委员（以后又加了徐伯昕同志），在中央还没有搬到北平以前，由华北局宣传部周扬同志领导。”

连后加的徐伯昕在内，委员共8名。但在赵晓恩写的《关于南下参与接管上海出版业工作》一文中，介绍卢鸣谷时，说他是：“出版委员会委员，东北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这样就出

现第9位委员。赵晓恩的依据是卢鸣谷曾经和他谈起过这件事。

为了解开这个疑团，我向参加过由周扬宣布出委会委员名单的这次会议的欧建新调查。据他回忆，并且查了他当时的笔记本。他说周扬在宣布黄洛峰等七人名单后，临时提出增加卢鸣谷为委员。最近看到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为编纂1949年出版史料收集的资料，其中有一件《临时出版委员会筹备会第一次谈话会记录》，开会日期与欧建新笔记本上记载的日期相同，也是2月16日。其中记录有周扬传达在他来北平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与他的谈话：“决定暂先在华北局宣传部领导下，由中宣部出版组、新华书店、新中国书局（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三联书店在解放区用的新招牌）等处同志合组临时出版委员会统筹华北出版工作。临出会委员，除陆部长函中指定的黄洛峰、祝志澄、华应申、平杰三、王子野、史育才、欧建新诸同志外，再加卢鸣谷、王钊两同志。”

正如欧建新所说，卢鸣谷是开会时周扬临时增加的。这次会议在华北局宣传部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周扬、黄洛峰、平杰三、华应申、王钊、卢鸣谷、欧建新等七人，王钊与卢鸣谷参加了这次会议，当然知道周扬增加两名委员的建议。

上面的会议记录说明，从黄洛峰到欧建新七名委员是陆定一信里指定的。据1949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出版事业致彭（真）叶（剑英）赵（毅敏）电”，那末，这七个人的名单确是中央决定的。电文中说：“组织临时的出版工作委员会，由黄洛峰（七人名单同前，略）……”。为什么到10月，黄洛峰在《工作报告》中，只提到中央指定的七名委员，加徐伯昕，而没有提到周扬提出的王、卢两位？在出席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出委会的代表名单中（代表七名，都是委员。史育才列为华北新华书店代表）也没有这两位，而把王钊放在列席者的名录里，身份是秘书室主任。由此令人怀疑周扬的提名是

否得到中宣部的批准。

组成出委会的 8 位委员的原属单位：

黄洛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

祝志澄，中宣部出版组；

平杰三，华北局秘书长；

王子野，华北局宣传部出版科科长；

华应申，中宣部出版组；

史育才，华北新华书店经理；

欧建新，新中国书局负责人；

徐伯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

出委会由黄洛峰任主任委员，它的机构有两处两室：

出版处：主任华应申，副主任徐律。

编校科：科长徐律（兼）。整理稿件，决定版式用字，校对，付印。

出版科：科长朱希。制订出版计划，决定印数，保管纸型、铜锌版。

杂志出版科：科长范用。校对、印务、决定杂志印数。

印务科：科长王仿子。与印刷厂往来，结算印刷费，掌握用纸，发货。

美术科：科长邹雅，副科长阿老。美术设计，绘图。

资料室

厂务处

管理科

技术研究科

印务科

材料科：科长邢显庭

秘书室：主任王钊，副主任程浩飞

人事科：科长王钊（兼）

文书科：科长倪子明

总务科：科长孙清泉

会计室：主任陈正为。

当时人员短缺，机构和人都是逐渐增加的。如印务科是我到北平后增设的，杂志出版科又晚一步，是范用到后增设的。以后又设宣传科，由我兼任。而资料室、厂务处等机构的负责人一直到出委会结束还是空的。

出委会的主要骨干由长期在解放区工作的工农分子出身的干部和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组成，是这两支文化出版队伍在新中国首都的汇合。到10月，出委会本部有职工87人，其中党员36人。从年龄说，20—30岁的占65人（其中有新招收的青年38人），是一支比较年轻的出版队伍。

### 三、统一版本，出版政策文件与《干部必读》

解放军一进城，面临的一个急迫任务是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所以，除报纸这个宣传工具之外，出版书刊亦刻不容缓。出委会一成立，立刻把主要力量投在出版生产方面，向新解放区大批新干部供应学习材料，向中小學生供应课本。除了数量上满足读者需要外，提高质量，统一版本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过去各解放区出版的書都是自编自印，版本不一，有的还是根据电报记录排印的，错漏比较多。这在当时战争环境下情有可原，如今进入大城市，几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了，必须重新校订，重排重印，统一版本，提高质量。黄洛峰在谈到这个时期的工作时说：“我们的任务重点，首先是出版文件、政策和干部读物，其次是教科书。统一版本，也就是从这几类东西开始”。又说：“中宣部的党内教育组和编审组，一直就为重新审订各种文件政策和干部读物而努力着。”

以统一版本为目的，出委会把过去出版的政策文件、文艺

创作等编成几套丛书。编入《政策丛书》的有《将革命进行到底》、《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解放区战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整风文献（订正本）》等等。

编入《人民文艺丛书》的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暴风骤雨》、《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赶车传》、《刘巧团圆》等 55 种。

1949 年 4 月中央决定出版《干部必读》，报经毛主席批准。出委会对这一项出版任务特别重视，把 12 种马列主义著作编成 8 卷，25 开本，直排，版面宽阔，行疏字大。每卷印 3 万册，其中布面圆脊、手工锁线（当时北平还没有锁线机）的精装本 11,000 册。这 8 卷排列如下：

第一卷：《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第二卷：《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卷：《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第四卷：《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第五卷：《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上册）；第六卷：《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下册）；第七卷：《马恩列斯论中国》；第八卷：《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以上各类图书，凡是政策文件和理论读物如《干部必读》等，用解放社名义出版，其他（包括《人民文艺丛书》）用新华书店名义出版。书与杂志统由华北新华书店总发行。

为了统一版本，每一种书一般都要打 6 副纸型，除自留两副外，分送东北、华中、华东、华南各一副，使全国印的同一种书只有一个经过认真校订的版本。

到 1949 年 10 月底，共计出书 315 种（合 371 册），印行 5,766,613 册。

#### 四、《毛泽东选集》与单篇本的出版工作

《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的编辑出版是中国革命史和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出委会一成立即把出版《毛选》新版作为头等大事,列入出版计划。

所以说“新版”,是因为北平解放以前,几个解放区已出版过几个版本的《毛选》。例如晋察冀,1944年7月,由《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主持,首次用《毛泽东选集》的书名汇编毛泽东1937年5月到1944年6月的29篇著作,约46万字,分编为5卷出版。1947年,晋察冀中央局在此版本上校订增补,出版1—6卷增订本,收入篇目扩充为43篇,约60万字。

东北解放后,1948年在哈尔滨,由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主持编辑的《毛选》,分编为6卷,合成一册,由东北书店出版。全书编入50篇文章,约84万字。

此外,在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俞铭璜、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盘石主持下,也分别编辑出版过《毛选》。

1949年中央决定出版新版《毛选》,毛主席亲自参与编辑和校订工作,以前各解放区出版的《毛选》一律停止出版。所有单篇本也由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委员会重新校订,各地再印,统一使用出委会的新版本。

我在6月到印务科工作时,《毛选》已在排校中。当时对《毛选》的出版除了要求不准有一个错字之外,还有一套严格的保密制度,不到公开的时候,对于编入多少文章,什么时候出版等等,任何人都不得泄露。直到1949年10月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黄洛峰在《工作报告》中才披露。他说:“《毛选》新版是中国党的一部最重要的文献,……毛主席的这部伟大著作,经过毛选编委会的重新编选,交给我们重新排版,我们认为是一种光荣的政治任务。”“《毛选》新版在5月6日发稿,6月初排完,6月

中旬我们校完了三校，现在编委会也已校对完毕，全部校样，正送呈毛主席亲自校阅中，业经毛主席亲自校阅改正后第二次送校的约有 500 面，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这两年我在报纸上不止一次看到某些人的回忆文章，说出版《毛选》是在毛主席 1950 年访问苏联时，由斯大林建议，才决定出版的。今年二月又在《文摘报》上见到在《毛泽东与书》的题目下，有《毛泽东选集的诞生》一段，说到：“1950 年毛泽东赴苏联访问时，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写过的文章编辑成集，公开发行，……1950 年 5 月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田家英为主要成员的《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委员会先行整理稿件，最后由毛泽东本人亲自审定。经委员会紧张而细致的工作，转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问世……”。从这段文字看，似乎毛主席从苏联回来后才决定出版《毛选》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不能否定斯大林有此建议，但是，在 1950 年斯大林的建议之前，在 1949 年的夏季，《毛选》的出版工作已在进行之中是铁定无疑的。虽然当时由于保密，出委会外边的人不知道，在出委会内部也只有处科级以上的干部知道，在编校科中非党干部不担任《毛选》的校对工作。《毛选》的校对由少数几个在出版校对工作方面有经验的同志担任。最近我问过当时出版科科长朱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1951 年 10 月 12 日，在全国出版发行《毛选》第一卷的这一天，出版总署召开一个小型的仪式简单的，却是很隆重的庆祝会。参加会议的有出版总署领导人，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委员会的十三位同志，还有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新华书店的有关同志，以及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田家英。署长胡愈之在讲话中说：“1949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开始接受了《毛选》的一部分稿子发排，到现在差不多将近两年半，才完成了第一卷的出版工作”。这篇讲话

又一次证明，《毛选》的出版工作从1949年夏季就开始了，不是在毛主席访苏之后。其所以要经过将近两年半的时间才出第一卷。因为“各篇取舍，经毛主席审慎考虑，存录者复亲加修订校阅，多者六七遍，少者亦两遍”（见叶圣陶1951年10月12日的日记）。

胡愈之和黄洛峰都肯定1949年5月6日为《毛选》第一批稿子发排的日子。把《毛选》列入出版计划的时间显然还要早一点。现在查到的4月27日出委会第9次会议上，出版处负责人华应申已提出要编制《毛选》精装本的成本预算。4月24日北平新华印刷厂举行开工典礼，出委会领导人在讲话中曾号召全厂职工为印好《毛选》而努力。到6月下旬，《毛选》全部稿子发齐，排成1,200面校样。据材料科科长邢显庭回忆，当时为出版《毛选》而采购的好纸（上海华丰造纸厂的圣经纸），因不准别的书刊使用，一直压在仓库里直到1951年。

毛主席的著作，除《毛选》以外，还出版许多单篇本，一篇文章一本。计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等等。每种一次一般印1万册。出委会规定，政策文件、毛著单篇本要充分供应，不得短缺。

为单篇本设计一个简练而庄重的封面并不容易，曾经使美术科煞费苦心。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最后选定只有一行直排的书名，作成阴文锌版，印红色，另加一行出版者名称，印黑色。这样一个封面一直沿用到人民出版社时期。

## 五、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建立联合出版社

出版教科书，也是出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有统一版本的问题。1948年黄洛峰还在香港的时候，为今后教科书出版问



题请示中央，得到的答复是：“已经决定统一编印”。1949年3月，叶圣陶到达解放区烟台，被电邀到北平，5月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由叶圣陶、周建人、胡绳分任正副主任委员。

1949年7月10日，中宣部发出《关于教科书问题的指示》，指出：“今后全国各地用教科书，除一部分小学教科书有地区差别之外，均应在可能条件下要求一致。华北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惟因成立不久，人力不够，尚未能提供整套的新教科书。……（列举书名，略）均在排印中，可由出版委员会以纸型（只送西北局、华中局、上海三地）或样书供给你们，以便翻印。”

过去，各解放区被战争分割，各地都是自编自印教科书，教材不一样，课程标准不一致。编审委员会成立后，就在华北、西北、东北解放区使用过的课本中选拔一部分，又从国统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出版的课本中选拔一部分，有的经过修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才重新编撰。

教科书的出版、发行，量大而时间紧迫，工作十分繁重，光是出委会和新华书店的力量远远不够。况且资金短缺，筹措纸张十分艰难。黄洛峰运用私营出版业的力量，7月初在北京建立华北联合出版社；7月底又建立上海联合出版社，吸收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北新、开明、儿童、广益等数十家私营出版社联合经营。华北由史育才、薛迪畅分任董事长和经理；上海由王益、万国钧分任董事长和经理。这南北两处的联合出版社成为出版与发行教科书的强有力的机构。既利用私营出版社的资金（新华书店和三联书店的公股约占四分之一），又利用他们的工作经验，使在这样一个大变革中课本供应工作得到平稳的过渡。这是解放初期运用私营出版力量为新中国出版任务服务的一个典范的例子。